

若干重大决策与 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25

若干重大决策与 事件的回顾

上 卷

薄 一 波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P 0 01 7 5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 卷

薄 一 波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8印张 35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35-0435-8/D·229

定价 13.80 元



作者近影

前 言

这是我的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写的是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故书名定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全书分为上、下两卷。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我奉命参与接管北平和组建新中国财经领导机构的工作。建国以后，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参与了财经和工交战线的领导工作，因此，对中央若干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和贯彻执行情况有所了解。多年来我有一个愿望，想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了解的情况为基础，再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写出一部书来。可是因工作量大，我又一直抽不出时间，迟迟没有动手。党的十三大后，中央分配我的日常工作有所减轻，这件事才总算提上研究日程。1988年4月，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

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项工作，当即得到了中央的赞同。在中央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关心、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部书的上卷终于在党诞生 70 周年的前夕同读者见面了。

上卷是回顾从 1949 年接管平津、创建新中国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8 年间的重大决策和事件。这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个时期，党的最重大的决策和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是党领导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卓有成效地恢复财政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成功地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开创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因此，这一卷的重点是告诉读者：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这一历史性决策的时代背景和客观依据，以及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实施这一决策的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巨大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士正在对中国 50 年代的这一伟大社会变革进行研究。我希望本书对他们的研究能有所裨益。

下卷的写作正在着手进行。这一卷主要是回顾 1957—1966 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10 年中的重大决策和事件。这 10 年，也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在探索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决策上的失误比较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一卷将尽量告诉读者：这些失误是怎样发生的，党和人民为纠正这些失误又做了哪

些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工作。深入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对我们在今后的建设中少走弯路，无疑是会有帮助的。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基本的总结。我完全拥护这个决议。我觉得，《决议》对许多重大决策和事件毕竟只能作出原则性的论断，它们作为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和进一步分析。我写这部书，也是想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由于本书不是写个人的事情，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回忆录；但又包含着个人的回忆在里面，书中有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我觉得，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去探讨，是我的责任。可以说，这部书是将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尽快写出一部好的“国史”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我的这部书，如果能为中央有关部门撰写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为有关研究机关和专家、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史料和参鉴，我就感到很欣慰了。如果读者同志们能从本书中得到一些启发，从而加深对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更加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进一步搞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推向前进,我就更感到欣慰了。

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薄一波

一九九一年四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接管平、津	1
	（一）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先期赴北平的任务	1
	（二）毛主席的谈话和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指导方针	5
	（三）平、津的做法和经验	9
	（四）进城以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18
二	新中国的建立	21
	（一）七届二中全会绘制的新中国建设蓝图	21
	（二）关于《共同纲领》	28
	（三）“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35
三	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	46
	（一）进城前的思索	46
	（二）天津讲话及引起的风波	49
	（三）春耦斋讲话	58
	（四）几点评说	61
四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	67

(一) 组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中财委	68
(二) 金融物价的初步治理	72
(三) 统一财政经济	81
(四) 初战胜利的经验	89
五 调整工商业	94
(一) 紧缩银根后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	94
(二) 中央关于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98
(三) 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和成效	101
六 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111
(一) 党对富农政策的历史演变	111
(二) 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120
(三) 实施情况和效果	132
七 贯彻防腐蚀方针, 开展“三反”斗争	138
(一)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	139
(二) 发动群众, 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	142
(三)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148
(四) 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	153
八 发动“五反”, 打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	161
(一) “五反”的发动	161
(二) 关系全局的上海“五反”斗争	168
(三) 要让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	175
(四) 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	178

九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184
(一) 争论经过	184
(二) 1950 年争论的继续	194
(三) 今天的反思	203
十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	212
(一) 1952 年秋后的酝酿	212
(二) 总路线的提出和最后确定	221
(三) 回顾中的思索	226
十一 1953 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231
(一) 财经会议的起因: 修正税制	231
(二) 财经会议的召开和会上对我的批评	238
(三) 周总理的结论和毛主席的讲话	243
(四) “误会”的解除	248
十二 统购统销的实行	255
(一) 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	255
(二) 两种“炸药”中的选择	259
(三) 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	267
(四) 统购统销制度的发展	272
(五) 改革中的评说	279
十三 “一五”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284
(一) “一五”计划的任务和编制过程	284
(二) 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290
(三) 展开以“156 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布局	296

(四) 从实践中摸索的可贵经验	301
十四 关于高、饶问题	308
(一) 高、饶政治野心的膨胀	308
(二) 高岗向党发难	311
(三) 饶漱石紧密配合	316
(四) 高、饶问题的揭露和处理	319
(五) 应该记取的教训	321
十五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	326
(一) 关于浙江整顿和巩固合作社问题	328
(二) 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之争	342
(三) 失误在哪里	355
(四) 对“五月变化”的一种分析	366
十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版	376
(一) 为什么编这部书	376
(二) 建国后的“第一次调查”	382
(三) 是非评析	387
(四) 社会效果	397
(五)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估价	401
十七 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	406
(一) 出乎预料的速度	406
(二) 大势之所趋	410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形式的选择	419
(四) 成就和问题	427

(五) 1956 年底毛主席同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	432
十八 加快速手工业改造的得失	438
(一) 我国手工业的特征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438
(二) 建国头六年手工业改造的进程	443
(三) 加快改造带来的曲折	448
(四) 用发展的观点看得失	458
(五) 对三大改造高潮的几点看法	460
十九 《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的调查和探索	466
(一) 调查和探索的目的	466
(二) 汇报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473
(三) 从听汇报到论十大关系	482
(四) 探索带来的新风	491
二十 向科学进军的两项重大部署	498
(一) 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后面临的新问题	498
(二) 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503
(三) 制定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509
(四)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517
二十一 反冒进和八大的正确决策	521
(一) 冒进倾向的产生	521
(二) 为组织好 1956 年生产建设反冒进	531
(三) 为拿出一个实事求是的“二五”建议反冒进	542
(四) 在探索中形成八大的正确决策	547
(五) 为编好 1957 年计划继续反冒进	554

上卷结语562

一 接管平、津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沿着毛主席提出的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9年终于获得了胜利。与此相适应，党的工作重心也由乡村移到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转变。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由城市到乡村的转变。那一次转变，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但是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次转变，从一开始，就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的。接管平津，是胜利实现这次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为新中国的建立举行了奠基礼。我对建国以后党的若干重大决策与重要事件的回顾，就从这里开始。

（一）革命高潮的到来和 先期赴北平的任务

进入1948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已经注定走向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开始了筹划迎接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局，是准备工作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年2月16日,在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同志(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继续留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同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向中央提议,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两区中央局合并组成华北中央局。他在征求彭真、聂荣臻同志和我的意见并报中央的电报里说:“这两大解放区完全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五千万人民的统一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是不可限量的。”毛主席接电后,于2月20日复电少奇同志,要他召集彭真、聂荣臻、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和我,就两区合并组建华北局机构,以及创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做些具体讨论。当时的形势是: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华北原来分割的各个解放区已经或将要连成一片。不失时机地将华北统一起来,对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是极为有利的。这是大的战略考虑。少奇同志主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原拟把山东和陕北都包括进来,因为饶漱石不同意,只把两大区合并在一起。在考虑华北局机构时,最初曾酝酿要我作书记。我当时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协助邓小平同志工作,小平同志到了大别山,中央局的事委托我主持。我考虑两区合并后的华北中央局由我主持,领导力量比较单薄,故建议少奇同志兼任书记。少奇同志说,兼任可以,工作

还是你来做。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一行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的河北阜平，同刘少奇、朱德同志会合。同年4月30日到5月7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举行会议，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张际春同志和我也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建立并加强华北、中原解放区的党政军机构。会后，中央于5月9日正式发出文件，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同志兼任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聂荣臻同志任第三书记；华北军区由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徐向前同志任第一副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先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中央还委托华北局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并任命了主要负责人。5月20日，华北局举行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少奇同志到会讲了话。他说，“毛主席提出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建立华北局同这个部署有联系。今后华北的方针是建设，它的工作带有全国意义。除非世界形势大变，美国进来，石家庄被占（这是不可能的），华北要长期建设，要搞计划，逐步走向正规化。”6月8日，华北局开会讨论办大党报问题，决定将《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定名《人民日报》。在它作为华北局机关报期间，我常看大样。到北平后，毛主席曾向党内高级干部提起过这件事，要求党的负责同志亲自抓报纸。华北局成立后，加强了建政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48年8月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